

專題研究

中共意識形態的轉變與政經體制的改革 ——中國民主的可行性分析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Reform of Politics &
Economy in Mainland China

莊惠然 (Chuang Hui-Jan)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摘 要

任何政治體系為求生存與發展，都會建構一套觀念與信仰，其功能是替政治體系的運作提供合法的統治基礎¹。中共在進行政經體制改革之前，即透過對本身意識形態的不斷修正，以便從中摸索出一條方向，作為任何改革的基礎和憑藉。本文即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將依序介紹中共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轉變，而這樣的轉變提供了政經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近來研究中共似乎已成為一股熱潮，尤其在政經關係方面，我們也將分析政經體制改革的關係，最後，歸結兩者的總方向，其實均蘊含著未來民主條件的可能性，就連大陸本身的學者也提出了這樣的預測，究竟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有無可能，抑或她真正有把握「經濟右、政治左」的改革路線，又或者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本文嘗試以宏觀的角度進行解析，對中國民主的出路提出分析。

關鍵詞：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民主

壹、前 言

在 80 年代末期，世界共產主義產生了巨大的變革，前蘇聯和前東歐共產國家紛

¹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臺北：永然文化出版社，再版，1991 年 12 月），頁 223。

紛解體，半個世紀的冷戰和意識形態上的對峙終告結束。然而中國大陸不僅未受此「蘇東波」的影響，反而以蛻變的社會主義大國姿態崛起，經濟上在 80 到 90 年代取得了快速的成長。自 1992 年 10 月中共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提出了以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而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進入另一個新階段²。

眾所週知，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中共的政治改革卻遠遠落後經濟改革。不少人悲觀的以為，沒有任何的可能性對中國這個以馬列主義為立國指導思想的政體，可以進行任何政治體質上的改革，因為那將意味著向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過程³。因為民主化勢必破壞中共權力壟斷的地位，造成中共統治國家的合法性出現動搖，中共當然不會去做這樣自我毀滅性的事情。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日漸發展與成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⁴，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雖然取得黨內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可是卻在十二大後才真正在歷史條件下建構出一條「鄧小平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化」道路，然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仍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於是鄧小平在其後的談話裡，便不斷強化與具體化這個概念，終於在「十三大」時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實踐性理論來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詮釋⁵。而這一理論性的政策綱領提出後，不僅為中共的改革找到了理論基礎，同時也造成中共日後意識形態運作上的轉變。

貳、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轉變

一、所謂「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和生活意義運作的媒介，它包括日常生活的概念、經驗和具體的知識學理。而「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即指「信仰體系」(Belief System)，它包括一套與人性和社會有關的規範性或經驗性基本命題，這些基本命題用來解釋或辯護人類現實存在或未來存在情狀，並指導或維護既存政治秩

² 羅成徽，中國當代政治制度（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初版，1993年6月），頁36。

³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政治改革和民主前景（臺北：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初版，2000年2月），頁13-14。

⁴ 國家安全局編印，中國大陸情勢概要（臺北：國家安全局，1998年4月），頁9-11。

⁵ 賴皆興，「鄧小平時代中共意識形態中的後殖民意涵」，東亞季刊（第34卷第2期，2003年春季），頁64。

序之發展⁶。或者，我們從內容分析和符號系統加以分析，如果它是以影響人們的政治行為導向的，我們就可以稱呼為政治的意識形態⁷，政治意識形態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指導、支持或激勵以及限定個人、團體與國家政治行為。

二、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與轉變

整體而言中共意識形態，其原初形態是「馬克思主義」，但其後的發展卻逐漸被「列寧馬克思主義」所取代，而後改造成「馬列主義」。及至中共由「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延安邊區建政，毛澤東取得正統地位，所信仰的「馬列主義」除了主要成分是史達林主義外，「毛澤東思想」已經滲入⁸。

毛死後，「四人幫」垮臺，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和「路線」遭到嚴重挑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旨在於解放思想，破除現代迷信，即是進行所謂的「非毛化」和端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⁹。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黨內理論家因批評文革之殘酷與反人道而重新反省馬克思主義問題。這象徵著中共在理論上已突破馬列主義的教條性，而回返馬克思主義¹⁰。

然而，回返馬克思主義，對鄧小平主政下百廢待舉的中國大陸是否適用，是一大大問題，鄧小平說：過去搞民主革命，是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此即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¹¹。

三、意識形態轉變後的方向

毛死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中心認為，必須為政權的持續發展有所因應，因為毛思想對中共政權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因此，修正後的方向大抵有如下幾點：

放棄階級鬥爭，突出「發展生產力」

即否定階級鬥爭的概念，並進一步強調生產力低落才真正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亦即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意識形態是強調「實際」的「建設成果」，表現出濃厚的「經濟取向」，是一種「唯生產力論」的觀點¹²。

放棄政治掛帥，強調政治要為經濟服務

經濟改革不只具有追求經濟發展的意涵，更有希望藉助經濟發展達到政治穩定

⁶ 姜新立，「中共意識形態之演變與發展（上）」，中共研究（第34卷第4期，2000年4月），頁77-78。

⁷ 李英明，大陸問題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初版三刷，1998年3月），頁50。

⁸ 同註3，頁80-81。

⁹ 同註3，頁82-83。

¹⁰ 同註3，頁85。

¹¹ 姜新立，「中共意識形態之演變與發展（下）」，中共研究（第34卷第5期，2000年5月），頁61-62。

¹² 同註2，頁225-229。

的目的，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不是「繼續革命」而是「發展生產力」¹³，我們將在下一節中討論中共政經體制的改革，是否能排除發展障礙，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修正自力更生，強調對外開放

過去中共把自力更生界定為不假外求、反對對外開放，主要是因為害怕受到資本主義的污染，破壞了社會主義的純潔性，但為求經濟發展，一反過去反對開放的主張，中共現強調社會主義本來就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主要是認為對外開放有助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¹⁴。

放棄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分配

平均主義的弊病在於生產經營的成果與企業和職工的「物質利益沒有直接聯繫」，起了獎懶罰勤的消極作用，在中共意識形態轉變後，強調及肯定「生產與利益」的結合。中共強調，社會主義的內在動力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社會共同利益」。而所謂的按勞分配，是指勞動者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等價交換」形式，總之，由於「消費需要」是人類基本的需要，與人類生產實踐有著直接關係，而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正是從人所具有的消費需求的基本點，基於這樣的認識，將有助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提昇¹⁵。

中共意識形態的轉變帶動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活力，然而，光是意識形態的轉變無法滿足整個國家發展的需要，鄧小平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即開始對整個中共體制提出一連串的改革藍圖。根據上述的意識形態的轉變作為理論依據的方向，我們將分別討論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

參、改革的理論意涵

中國該往何處去？在「毛澤東思想」破產後，必須要有一個新思想被提出來以因應現實「政策指示」的需要¹⁶，然而，任何的「理論」、「思想」、「主義」，只要掛上統治者的名字，便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為了執行鄧小平的改革藍圖，為了給總工程師的「改革開放」、「二次革命」偉大事業理出一條「頭緒」，其實也是為了詮釋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合法性，中共的社會主義理論界提出了兩種理論概念：

¹³ 同註2，頁229-231。

¹⁴ 同註2，頁232-236。

¹⁵ 同註2，頁237-242。

¹⁶ 同註8，頁66。

「新威權主義」與「小政府、大社會」¹⁷。這兩種理論都與東歐的社會主義經驗有關，並以「六·四事件」、東歐巨變與蘇聯解體作為分水嶺，分別詮釋了鄧小平兩個階段的改革思想。

一、新威權主義

首先主張「新威權主義」學者如張炳九、吳稼祥、蕭功秦等，其目的為經濟的成長，以及對於下列兩項的認識：在經濟上，大陸迫切需要自由市場改革；在政治上一個原本高度極權的政體，其權威有逐漸下降的趨勢¹⁸。這一理論的模型如下¹⁹：

經濟和政治相統一的歷史模型		
集權式政治體制	半極權式政治體制	分權式政治體制
傳統經濟體制（計畫經濟）	發展中的商品經濟	成熟的商品經濟

它的內容大要是：大陸在目前的條件下，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應該採取半極權式的政治體制。由一批強而有力的領導人物強制性的推行現代化，比馬上實行民主更為可行。新威權主義者認為，東亞四小龍的成功就是採取了這樣的策略²⁰。而從中國國情角度出發，中國生產力還不發達，為避免淪為低度發展、依賴列強的貧窮困境，必須一方面實行市場經濟發展國民經濟，另一方面則必須借助共產黨的領導，以國家力量對抗外國資本勢力的入侵²¹。

可是「新威權主義」卻有一個矛盾點，即它無法解釋到達「社會主義高階段」前，必須有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否則就是歷史階段的跳躍，違反了歷史唯物論的原則²²。「新威權主義」的觀點無法解釋這樣的矛盾，反而導致了政企不分、官商勾結、貪污腐化現象，進而導致了「六·四事件」學生反貪污、反官僚的現象，隨後便在學界銷聲匿跡。

二、小政府、大社會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六·四」後，中共十四大通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是從「市民社會」發展出來的一種政策主張，1990年，江澤民、李鵬、宋平與1991年新春期間的李瑞環，先後四名「新一代領導集體」，異口同聲要求堅持「小

¹⁷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治發展（臺北：政大國關中心，初版，1994年6月），頁10。

¹⁸ 陳如音，「中共政權類型初探——從威權理論的觀點出發」，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1期，2002年11月），頁65。

¹⁹ 房寧、趙會民，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北京：北京出版社，初版，1995年3月），頁268。

²⁰ 同註14，頁11。

²¹ 同註14，頁14。

²² 同上。

政府、大社會」²³的改革，這個主張最先在學術界出現，得到肯定與鼓吹後，成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一個政治發展理論頭緒。

「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內涵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來面貌」。而此一馬克思的本來面貌，又是以馬克思「市民社會」的概念為基礎。至於什麼是「市民社會」，根據中共學者從馬克思的理論得出為：「市民社會」既是指人類社會的一個特定發展時期，又是指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私人活動領域，其中主要的是私人物資交往關係²⁴。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階級將被消滅，到時市民社會也將隨政治國家消亡²⁵。

根據「小政府、大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政策，一方面適應鄧小平的世界局勢「機遇論」，可以快速的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另外一方面也從理論上解決了政府權威的問題，給予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性地位²⁶。根據這個理論，中共已在「海南省」實驗，至於成功與否尚待時間來證明。

不過，在此我們已經找到了中共在改革發展上的理論基礎，它是以鄧小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原則，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²⁷。而在文革後，各方面的制度陸續恢復，但卻產生無法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尤其改革開放後，體制的改革修正更是迫在眉梢，而其中又以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為最重要，因為這是改革開放理論的核心。

肆、中共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大陸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相當程度的引進了資本主義模式與經驗，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整體改革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政治方面的自我完善，因此，它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也必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²⁸。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它是改革開放下的產物，它必須依循三中全會以後的決議，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而且改革必須在四個原則下進行，這四個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²³ 同註14，頁19。

²⁴ 同註14，頁23。

²⁵ 同上。

²⁶ 同註14，頁30。

²⁷ 遲福林、田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初版，1998年11月），頁475。

²⁸ 同註2，頁44。

一、庚申改革的提出

所謂「庚申改革」方案，是由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所提出，其具體內容包括：修改憲法，以確定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實行黨政分工；改革企業、事業單位的領導體制；實現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民主四個方面²⁹。這一方案的提出代表中共決心進行整黨、整風的工作。

二、官方構想與試行

根據「庚申改革」方案及鄧小平的改革理想，中共官方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而主要係偏重在機構的改革上³⁰：

黨的體制改革

恢復中央書記處的設置，1982年9月十二大又對黨的組織做出重大改革：一為設立顧問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二為改「主席」為「總書記制」。並實際上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陋習。

政權領導體制的改革

為轉變黨政領導幹部兼職、副職過多現象，從中央著手，自上而下逐步改革。

全面進行機構改革

1982-1984年，中共全面進行機構的精簡，對屆齡的老幹部離、退休做了規定，以全面提拔年輕幹部。

改革國營企業領導體制

提出國營企業內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使廠長擁有企業生產的決策權和行政管理的指揮權。

加強地方建設的民主建設

提出全國縣以下人代會由直選產生。

三、大陸理論界的反應

大陸學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也相當的熱烈，不僅是對現有政治體制的不滿，也對今後的改革有所期望，其論點如下³¹：

提出政治體制全方位的改革主張

認為改革的的初始階段，用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衝擊僵化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是必要的；又強調現代化除了「四個現代化」之外，還必須包括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的現代化。

²⁹ 同註2，頁62。

³⁰ 同註2，頁64-67。

³¹ 同註2，頁67-71。

要求借鏡西方政治體制經驗

改革要引進新觀念，包括西方的管理制度、監督制度、法律管理制度等，都可為借鏡。

提議政治改革的實質就是民主化

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政治問題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其次，要實事求是的對待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不可以只要專政，不要民主。

總的來說，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成績雖然不盡理想，離我們所謂現代化國家的標準上有一段距離，不過，這畢竟是跨出了一大步，當它已對外敞開大門時，便是已經開始它現代化的腳步，當中共當局為求其政權的穩定及統治的合法性時，政治改革的訴求將能更進一步深化，政治上的談判勢必也將獲得妥協，如果這一切都可以樂觀的預測，那麼該政權的內部民主化將有可能初步實現，尤其接著我們探討其經濟體制的改革，根據前述意識形態的轉變，政治體制改革是為經濟服務，改革開放的重心便是經濟，經濟的改革如果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那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將受到嚴苛的挑戰。

伍、中共經濟體制改革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內容

中共的經濟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至於其具體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則是根據十二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內容有³²：

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

經濟改革是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改革的進行必須是促進而不是損害社會安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狀況進行改革。

以增強企業活力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

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保證勞動者的地位，以及確立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並以城市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建立計畫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必須有計畫的指導、調節和行政管理。

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

³² 吳國衡，當代中國體制改革史（北京：法律出版社，初版，1994年11月），頁143。

價格體系是整個經濟改革成敗的關鍵，其改革的原則：第一，按照等價交換的要求和供求關係的變化，調整不合理比價；第二，避免提高工業消費品價格；第三，農產品的保證收購價格，使農民收入受到保障，並隨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合理提高工資。

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

今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業，而少數由國家直接管理的企業則下放權力，按照簡政放權的精神，妥善處理政企關係。

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

這種責任的基本原則是：責、權、利相結合，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統一，職工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符合。

積極發展多種經營模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

利用外資，吸引外商投資合作經營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市場。

啟用新人，培養經濟管理幹部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提高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培養企業生產和經營廠長（經理）。

除了上述這些經濟體制的內容外，有關經濟的其他方面改革上還包括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包括：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積極發展農村合作制），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簡政放權，強化企業活力，以及從宏觀經濟管理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這些的商品經濟和經濟體制的改革的深入，引起經濟實質的獨立化、經濟決策分散化的趨勢³³。這些經濟改革帶動了經濟的繁榮與增長，不過背後卻也隱藏著許多的矛盾，諸如貪污腐敗盛行、貧富懸殊對立、兩極分化、工人下崗失業、治安惡化、社會不穩，既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經濟改革的突破必然也要求政治改革的突破，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其路線只是不斷的在修正，而不能再走回頭路了，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雖然仍標榜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可以預見的，這波改革的持續推進，政治上的改革勢必又將進一步推進，兩者的關係就如鄧小平所講的「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³⁴。

³³ 同註 14，頁 78。

³⁴ 蘇紹智，「中共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上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2 年 11 月），頁 5/27。

陸、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

危機與轉型

共產主義的危機是制度性的危機，危機在該制度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內生的。這個危機使得共產政權的三個基本支柱都瓦解了，也就是指令性的經濟，一黨專政，以及指令性經濟和一黨專政合法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失去原有的功能了。一個原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和要從內生性危機意識中解脫出來，就必須要有兩個新的制度條件，即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³⁵。

因此，共產政權在「蘇東波」現象後，便一一轉型以為因應，而轉型即是根據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轉型。經濟體制的轉型是從指令性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政治體制的轉型是從一黨專政轉變為民主政治，這兩個轉型相互促進、相互支撐。之所以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合，是因為指令性經濟原是和一黨專政互相支撐的³⁶，鄧小平很清楚的意識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如果政治轉型與經濟轉型各自分階段進行的話，那麼只推動經濟改革而拒絕政治改革，那麼民主將永難實現，改革的過程亦會充滿艱辛。

可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兩方面的相互促進，對民主的實現是有其可能的，中共的改革開放其中心點便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又強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兩者必須相互配合，根據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當經濟成長到達一定程度時，社會將更趨於穩定，同時人民收入所得提高，教育水準提高，個人意識高漲，緊接而來的便是要求政治上的擴大參與，這樣民主就會逐步在政治制度上落實。同樣，中共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在其意識形態逐步的修正上已經漸上軌道，當這改革的列車一但啟動，當權者勢必無法再走回頭路。

另外一方面，由於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帶來經濟的成長，而政治的體制改革成績卻不甚理想，導致了特權階級利用職權中飽私囊，貪污腐敗日益嚴重，而失業人口亦日趨嚴重，人民對政治的不滿日趨強烈，這將導致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勢必又將更加速其政治上的改革，藉回應民眾的不滿以緩和政權不穩定的威脅。

中國大陸學者黃衛平提出一種主張「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中、融政治體制改革於經濟體制改革之內」，他的論述是這樣的：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初衷和原動力本來就是經濟和政治二元一體的，中國大陸的改革蘊含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在內的政治

³⁵ 同上。

³⁶ 同註31，頁5/28。

（行政）體制改革，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建設法治國家是內在統一的；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基礎和客觀需要³⁷。可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確實已經為大陸民主種下種子了。

柒、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

民主的概念業已成為當今普世的價值觀，不論這個國家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國家，都將「民主」這兩個字拿來作為其合法統治的依據。只是「民主」的概念往往遭到扭曲，或是統治者的任意解讀以符合統治上的需要，以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民主充其量只是其現代化過程的海市蜃樓。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強調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它是藉由開放達到自我完善，尤其自鄧小平掌權以來，打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放棄「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並對資本主義靠近，雖然中共當局仍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如同過去中共官方一貫的做法——不是全盤否認就是解釋為過渡階段的必然現象。而且其強調中共亦講求民主，這個民主的概念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它是人民民主專政，是民主集中制，這些都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需要。

概念上，這並非是我們認知上的民主，而這裡我們所要談的民主是自由民主，是尊重個人自由的，是由人民統治的而非少數階級統治，它不同於「人民民主專政」——對大多數人民主，對少數人專政。

基於此，大多數人對中國的民主化是悲觀的，經常提出的理由是：認為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阻礙民主的實現；是認為中國仍很落後，缺乏支持民主的中產階級³⁸。就這第一個觀點而言，儒家文化自民初以來再西化過程中即一直受到批判，甚至在中共文革期間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可是儒家文化並未因此消失，可見其價值仍有其博大精深之處，如果一味怪罪儒家文化是絆腳石，卻不知從體制改革著手，恐怕是「欲加之罪」；另外，中國經濟落後缺乏強大的中產階級，則似乎有言之有理，不過以印度為例，其國民所得甚低，卻有相當程度的民主化，如果一味的迷信「經濟高成長」才會有「民主化」這個「神話」，那麼恐怕是當政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政權的藉口。

因此，這兩個理由都不成立，加以目前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成長正逐漸提高，

³⁷ 徐斯儉，「中國大陸九〇年代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2期，2001年2月），頁16。

³⁸ 同註31，頁5/35。

則日後勢必帶動中產階級的壯大，又改革開放後，大陸當局對資訊的控制已不若以往，一般人接觸到外面世界的管道變的容易，觀念已逐漸在轉變，儒家文化的影響力正逐漸式微。並且大陸目前存在著三個有利於民主的因素。第一，市場經濟的成長產生了相對獨立的生產者，他們會逐漸形成不同的利益團體，並從各自的利益出發要求參政，這將促進多元政治、多黨政治和民主化。第二，大陸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的成功，形成了村民自治，逐漸擺脫中共對基層的控制，今後農村居民勢必會更往上一層級的直接選舉之要求，從而構成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面向。第三，立憲民主的要求在大陸朝野上下得到越來越廣泛的的認同，大陸憲法雖不完善，但也包含了重要的民主思想，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國人代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公民人身自由不容侵犯」，民眾對於行憲、修憲、實行人民依法治國，已有越來越強烈的要求³⁹。

有了以上的辯證說明，我們對大陸的民主前景是樂觀的，民主化的過程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及，它需相關條件的配合以及內外因素的影響，在杭廷頓的第三波中所提到的一個概念：民主化的浪潮雖然也會發生回潮的現象，但基本上世界民主的進程是「進兩步、退一步」，民主終將成為一個普世價值，大陸當局的改革開放，我們無法證明是否就是搭上這一波民主的浪潮，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列車已經啟動，即便過程有些波折或是停止，但卻已經無法回頭。

捌、結 語

本文從一開始介紹中共意識形態的轉變開始論述這樣的轉變提供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然後根據鄧小平的改革藍圖，其核心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依照這個基本原則，提出了兩個理論依據，而以「六·四事件」作為兩個理論的分水嶺，或者說是理論上的轉變，「新威權主義」在「六·四事件」後就從學界消失匿跡，而「小政府、大社會」卻是仍在試行階段，然而中共改革開放的腳步卻未因此而放慢，它仍是依照「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向前進，尤其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兩者相互配合、相互依賴，不僅是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的一種回應，亦是對該社會主義的一種自我完善，使「社會主義的初階」獲得更進一步開展，我們藉由這兩項的改革發現，它正循著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路線前進，即便官方一再的否認，但仍可看出這一明顯的轉變。

³⁹ 同註 31，頁 5/37-5/38。

文末我們得出的結論可說已經相當的明顯，但尚有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可以轉變的，那麼會不會放棄呢？」，另一個問題是「以目前的政經體制改革方向，中國會不會出現另一個戈巴契夫？」，這兩個問題我想我們並無法在本文中進一步去回答，只是這兩個問題對於我們在寫作本文的方向上，似乎又有那麼一點關聯，如果中國的民主是可以預期的，那麼以歷史為鏡，自然這兩個問題的方向似乎又不證自明了，即便我們對中國的民主是如此的客觀，甚至預期它的可能性，但卻無法提出明確的時間表，是 10 年、20 年或更久，這是學界上的遺憾亦是兩岸中國人的痛，我們只能期待中共經濟的快速起飛，加快政治改革的速度，連帶使民主進程逼近，而這將是大家所樂見的。